

RIPE 2022 實體年會 • 再見故人與全新擁抱
(Re-envisioning Interpretation on Public Media Enterprise)
喜見維也納仍是一個各方勢力整合的輻軸點

程宗明

前言

2022 年 9 月 17 日夜間飛往維也納，飛往曼谷的人數只有座艙的 1/3，然飛往維也納的則是爆艙滿滿，兩相比對就是後疫情時代，亞洲與歐洲文化全然的不同反應。幾經考慮，決定勇赴前線，這是 RIPE 論壇創辦第二十週年 (2002 年第一次在芬蘭舉辦)，也是台灣公視研發人出席 RIPE 第十年的紀念 (第一次為 2012 年在雪梨舉辦的雙年會)。除了今年強調只有實體的研討會考量，同時也首次將「新聞與社會」議題作為主題，向全世界徵集稿件。

另外，本次研討會也是第一次召開 IAPMR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ublic Media Researchers) 的會員大會 (實體)，這個取名為「國際公共媒體研究者協會」象徵從芬蘭起首以來，從浮動的年會召開正式進入到組織化，並開始招募會員與擴大各界的交流。維也納的雙年會，應該就是實體發動一個研究團隊的新時代，開幕時永續召集人 Gregory Lowe 提到，這個逐年發展下來的學術社群如同家人關係一般，能在三年中度過疫情的衝擊，成功與今天與大家面對面相見，著實感恩與珍貴此刻當下，使本次研究大會的開場，充滿了溫情許許。



第一日在維也納大學舉辦歡迎會； 第二日正式開始 RIPE 於奧廣電總部演講廳

本年度公廣主辦者 ORF (Austr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開幕實務大會

9 月 19 日一大早的集合點，國際研究公廣學者現身，大家互道早安與亮眼的寒暄，維也納天氣秋高氣爽。我做為唯一的亞洲出席者，預計應該都是禮貌地向素未謀面的青年學者寒暄，沒想到在一個圈子中被認出來。PMA(Public Media Alliance) 執行長 Kristian Porter 居然立刻提起我名，說很高興見到我，也提到幾週



以前在網路會議的討論 (8/25 歐亞會議 Roundtable: Emergency Broadcasting)，我感受到那天清晨 4 點鐘爬起來與他們會面，真是有價值。

沒料到頃刻片後，我們這個小圈又來了一位奧地利資深學者 Paul Murschetz，這下我就搶先說了我的身分，Murschetz 沉默片刻突然眼界大開，我們相擁而抱，Paul 其實是我在 22 年前於網路上請益的學者，當年為了廣播電視數位化 (1.0 時代) 的參考，特別在電郵世界中請益 Paul 有關 ORF 的做法，我們留下了良好的溝通，他同時寄來一些研究資料。2014 年我初次來維也納，也與他招呼，那次無見面可能。怎知，今年我們在同一場盛會中發表相關論文，這樣的奇緣與終極會首，豈不快哉。當下，我把 20 年前他寄給我的名片展示給他看，並讓他留念存有，他直說今年這次終相逢，會時常想起讚嘆這件奇事。



PUBLIC VOICE Lab

Operngasse 24
A-1040 Vienna
Austr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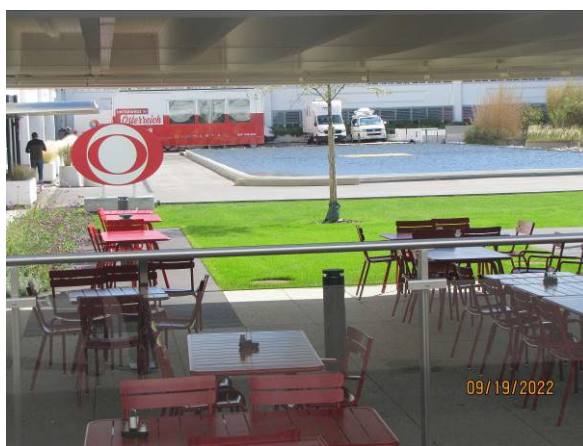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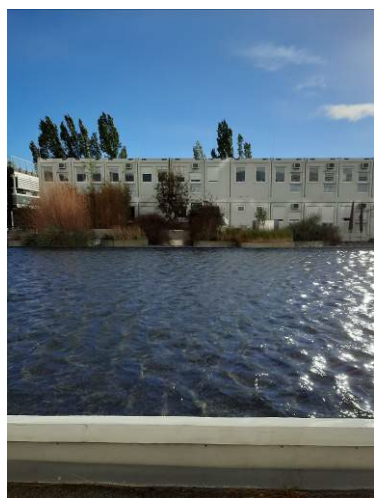
Paul Murschetz
Projekt Manager
and Researcher

T (+43 1) 585 22 80-21
F (+43 1) 585 22 80-99
M (+43) 699 100 95 201
E pmur@pvl.at
W www.pvl.a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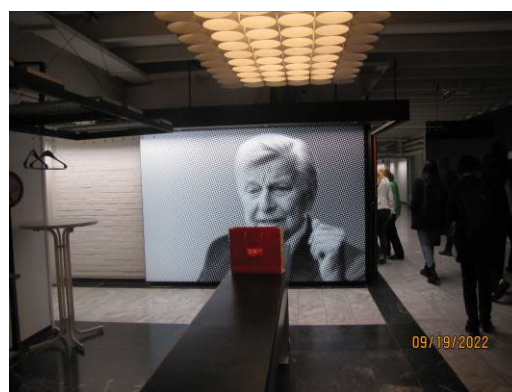
Unified Messaging Research and Services

我在往 ORF 的通車上與 Paul 合影，右邊是當年他致贈的名片

也是第二次來到 ORF，這真是一個媒體城，無窮寬廣的基地與樓層建築，導引我們進入水池大廳的奧妙之處。



本次主辦單位 ORF 的領導者，為負責公共價值計畫主持人 Klaus Unterberger，已經有兩年時間，與 RIPE 友善往來，今年主持起來很有影響力。在開場時，除了對主題與會場議題進行解釋，特別介紹了奧公廣的新聞界傳奇與領導人物 Hugo Portisch，此人不但建立了新聞的獨立性，也影響了關鍵時期該國舉辦公投的意向。換句話說，他不但是媒體人，也是影響政治發展的公正人物。Klaus 特別提出來紀念，希望我們了解奧地利公廣在新聞與社會上的影響卓著之地位，而 Hugo 於 2021 年以 94 歲高齡過世。這使我想起來，2014 年 10 月 5 日在當地報紙見到紀念 ORF 總部建設開工的報導，其中就有 Hugo 的關鍵發言 (KURIER，38 版文化)。事隔 8 年，又再憶起故人，十分感念。



左：KURIER 文化版紀念 ORF 的創始人物；右：在演講大廳見到 Hugo 的照片肖像

這使我想起，2012 年第一次出席 RIPE 在澳大利亞的會議上，也同樣於其演講大廳上，看見對 Eugene Goossens 的紀念表達。不禁想想，有一天台灣公共電視要在自己關鍵的展示廳上，紀念哪一號人物曾對公視有其深厚的影響力？

接續 Klaus 的發言，Gregory 做正式開幕致詞，對於本年度的主題 ”between the Fourth Estate and the fifth power” (處於第四階級與第五力量的修鍊) 展開釋義。傳統理想性的公廣新聞，就是一個具體展示，獨立於國王、教士、貴族之外的社會衡量機制。然目前的世界劇烈改變，更多於第四權之外的興起主體，進入新聞製播的供應鏈，甚至很多科技界沒有任何新聞訓練，如平台業者進入產生很大的影響力，使用各種創新手法與科技，都號稱一個新的新聞生產單位。所以，這是新生的勢力龐大，足以到了形成一個第五權勢的力量，影響到公共廣電新聞圈的運作與地位嗎？

好的提問，首先還是聽一場浩大的政治動盪場面，就是近年來英國 BBC 遭遇的攻擊與戰爭 (其書出版名為 *The War against the BBC*)，由倫敦商學院大學市場學教授 Patrick Barwise 進行專題演講，他強調在這場文化論戰中，甚至高升到政治機構的政策攻防上，要以經濟數據與例證來捍衛 BBC，這是他貢獻出來的經驗。他將 BBC 視為一種資產投入，強調市場力如果缺乏了 BBC，對整體英國人喪失的價值有多大，並從此引述平均家戶支付執照費的價值所在。一個拯救 BBC 的立論，動用如此多的經濟力與研究資源，是這場專題演講中看到的新視野。

芬蘭學者 Minna Horowitz 作為回應者，她以參加 RIPE 論壇二十年的體驗，來看待今年的主題意義。首先她指出，所有捍衛公廣理念的想法，都是內聚與正向的，以致容易形成盲點。她在第一年的 RIPE 論壇發表後，受教於公廣研究大師 Karol Jakubowicz 的嚴格批判 (此人也是 2000 年開始，我在台灣公視研究部門寫作中，引述的第一個哲人)。她第二個提出論點，就是注意公廣機構是一個變動性的行動主體，尤其是網路服務與年輕人需求，已經無法迴避，甚至成為主體。



Minna Horowitz 回應 Patrick Barwise (photo by ORF /Hans Leitner)

Barwise 教授也提出一個困境，但也是實境，就是三發投資不能少，第一是投資在既有的基礎建設與傳統觀眾；第二是投資在新媒體 2.0 到 3.0 的持續發展；第三是投資一切不能被限縮的新平台服務，就是迎合年輕的受眾。而這個事實，不容被 MIT 的媒體大師 Nicholas Negroponte 那種宣告千禧年是廣電末日論（著作：Being Digital），所蒙蔽，這一席話也讓人相當振奮。

聽完了 BBC 的專題，接續進入本次大會的主題：「第四階級與第五種修鍊力量之間」。ORF 委託的研究團隊，Natascha 教授首先破題，認知上一個夾在中間的困境產生自公共廣電機構，就是一方面由 user 躍昇為製作人 producer，開始生產新聞與資訊；另一方面，有如歐洲 Digital Services Act 定義下的平台業者，成為另一種訊息守門人，但是靠賴非民主原則的演算法來過濾資訊。而公共電視就是處在前兩者之中，是一個尷尬的腳色，但也是一種很有承軸意味的角色。

接續 Leonhard Dobusch (另一位跨學界與傳播界的 ZDF 董事之一) 破框提出一些面對第五力衝擊的對策，他說有三樣趨勢，PSM 應該去接軌引入：第一是 Copy，公共廣電應該去從 UGC 世界取材，將最新文化產品變成自己的文化語言；第二就是數位轉型，利用 transform 的介入，將平台經濟 best practices 轉入公廣的管理；第三就是 combine (Open source)，開放資源與外界合力發展，這裡他指出 Wikipedia 就是一個最好的典型；但是如果從管制法規角度看待，媒體法規專家 Krisztina 提出，目前主流的管制仍在負面管理的思維上，難能與目前網路世界當道，而主流媒體逐漸失去優勢的矯正接軌，這是相當令人扼腕。而最後由學者 Dimitri Prandner 發表回顧研究，從過去十年論，社會危機發生，就是最好測試信賴度與對媒體期許的時機，他以金融危機、移民爭議、以及新冠肺炎三個重大事件為例，確認第四階級的期許在公共廣電業者與其支持民眾中，普遍獲得認同。

第二輪發言中，Dobusch 持續質疑歐洲傳統公共廣電，是否願意更緊密與網路平台業者的合作，而且是否放下 branding 的概念，讓網路世界更貼切現實。Krisztina 認為，willing to pay 決定了目前在網路上可行的公共服務平台命運，但是如果教育文化類可以這樣生存，也是一條路線。不過，她話鋒一轉，檢討目前歐盟為主體的管制架構，充滿了 accountability framework 的課責，主要落在 PSM 經營者的肩頭，另外又有 ex ante 的公共價值檢測模式 (public value test)，來橫阻一切要推出的公共服務新模式。這些新的法制架構與基模，只有使報告要更多產出，而且讓管理者承受更多重擔。主持人 Klaus，立刻回應，目前法尊已經多到令公廣人窒息的地步 (suffocate)，他轉問歐盟在努力界定市場的未來管制時，有否想到 PSM 對於文化社會的責任。Natascha 教授回覆，歐盟從負面管制出發，針對仇恨言論與 misinformation 先開始預防管制，但是懲處成效可能不容易達成；反而從法國的文化國本角度，較有能力提出不同的管制想法。如果對於現存的平

台經濟有所管制效果來說，法規如果能透明化演算法則的運轉，這就已經很優質的管制結果。最後，目前將出爐的歐盟媒體自由法，可能是最相關 PSM 價值觀的一次行動，值得關注與認同。

第三輪的討論，指到了匈牙利個案，這個令歐洲資深的廣播電視專業者汗顏的事證，就是處於中歐的核心地帶，居然在 21 世紀初有一個沒有自由媒體運作的國度，主持人 Klaus 感到不可思議。在匈國生活的 Krisztina 回應，這個轉變歷經了 12 年的漸次惡化後的結果，導致目前該國年輕學生，不知道公共廣電媒體的真實長相為何，以為這等同於國家宣傳機器，而年輕人要從社群媒體中，才能體驗何謂公共媒體的國際精神，當然歐盟是否有一個資助反抗的功能，但她斷然說，不可能指望歐洲執委會 (European Commission) 能做任何幫助。Dimitri 回應這個問題，改革與對抗最先要由第一線工作的新聞人員，提出問題的關鍵處，做有效的社會溝通與示警，不能只在象牙塔的範圍內做這種對話，這無法遏止逐步侵蝕新聞自由的政治圖謀。Natascha 的回應，則指出 ORF 需要對於中歐的問題有投注努力，而社會各界要對公廣有要求，有批判的態度，才能一起成長，而且要尋找一個新的 Narrative，才能與年輕世代對話。

最後一輪談論，是對於公廣新聞記者的期許。Natascha 認為，品質維持為第一，然後要 reach 年輕世代，如同 podcast；Dimitri 認為，永遠站在公民的意義立場上；Krisztina 認為，要讓公廣服務 personalized 化；Dobusch 認為，新聞記者要” confront against reality，subscription to uber media”。

至於公廣在網路媒體世界該做什麼，似乎如 Christian Fuch 與 Klaus Unterberger 共同宣言，就是回到本業的優勢，就是累積歷代的影音 archive，從數位化過程中，聯合版權開放、網路平台的公共介面、大量遍植這些影視的影響力，而非從平台介面的經濟著手，甚至要與演算法與搜尋引擎上一決高下。



第一場的小組討論由奧地利學者對主題作破題之報告

下午展開第二專案小組討論，取名為事實的開箱查核 (Reality Check)，公共問責與獨立性發生了什麼問題。首先，備受矚目的 ORF 新聞節目主持人 Armin Wolf (現任公共電視新聞部副總編輯) 出場。他以流利的英語提出看法，很清楚表達傳統公廣人在政經動盪的時代中看法。首先，新聞人的獨立性經過時代的爭取，才能說有所成。以奧地利為例，一開始政府以頻道稀有性為由，讓公共廣電獨佔，但是政治人物的影響並沒有少過，以 BBC 為例，他們的獨立性來自各種政治人物的自我節制，但是自從 Tony Blair 政府之後轉趨壞損。而財務狀況的惡化，如轉化執照費到國家稅捐，造成政府控制轉劇，如法國今年通過的改革。然奧國而言，過去六十年來並非一帆風順，而且近五年而來的攻擊干預，也轉劇烈。

他分享了幾年前與右派政黨 FPO 黨魁之對戰，也是國家副首相 Heinz-Christian Strache 在自己的私人臉書上，以戲謔角度反映他受訪後的不滿，直指出 ORF 新聞是說謊造假 (木偶奇遇記的鼻長為比喻，Pinocchio)，這則他覺得有趣的評論，Armin 不覺得這樣，為了捍衛新聞部的聲譽，他首次向法院提出告訴，最後和解，Strache 賠償 ORF 的損失，而這筆錢轉贈給研究政治的科學性基金會。這是他認為一個活生例子，也說明近年來歐洲惡化的政媒關係之顯例。



以上為這個事件的原刊文件 (對 Armin Wolf 的揶揄)，巧合的是我在本次發表論文中也做了台灣與奧地利 (就是這個案例) 的比較研究

最後，主持人 Klaus 再次訪談 Armin 對於當前社群媒體的看法。Armin 坦誠地說，社群媒體從來沒有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但是目前 16 歲以下的世代，只看社群不看媒體，這必須讓他們 ORF 連 TikTok 都要上去開頻道 (serious journalism)，更不要說 IG 與 FB，還有其他種種。他的直言，讓大家很暢快。

Armin 離席後，就嚴肅一點進入了解近鄰斯洛維尼亞的長久爭議。公共廣電 (RTVS) 的記者 Ksenija Horvath 現身說法，她指出三十年前，剛脫離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時，他們還享有一定的媒體自由，但是今天說來，完全變色。幾年前，中間偏右政權贏得大選，就從廣電委員會到董事會一路換人，接下來聘任總裁，然後聘任電視部門總監，然後聘任新聞部總編輯，這一系列的人士更換的目的，就在執行政府的意志，所謂徹底被政府俘虜 (media capture)。而這指導過程中，如果新聞記者不服從，就會受到迫害與解職。

今年右派政府下台，換上中間偏左政府，居然還是如法炮製。但是，他們有了新的抵抗，包括組織工會，外援有媒體聯合協會的指導，而且透過網路媒體向外公布這些內部的控制，贏得至少關心此事公眾的支持，他們得到階段性的勝利，但是 daily fight 並沒有結束。



斯洛維尼亞勝過諸 CEE 國家，讓

Ksenija 是第一位從公廣抗爭前線前來討論的記者，備受現場矚目

Ksenija 所說的與海外所聽聞之間無太大差距，顯見工會與 EFJ 歐洲記協都有傳達到現場狀態，但是令我想到了 Boris Bergant 這位斯洛維尼亞公視大使。當年 (2000-2010) 這個小國有一個大的公共電視統領 (Director-General)，他叫

Boris Bergant (居然是斯拉夫名)，常年兼職歐洲廣播電視聯盟的副主席，很有代表性，Boris 出身於新聞界，專業投入與獨立呼籲，這正足以說明 RTVS 真正有那黃金的二十年，但是如今變動抖落神壇令人嘔唏不已。



Millenni

Boris Bergant
EBU Vice-President, RTVSLO

The new

Never before has human history seen a century comparable in scope and speed of technical development with the one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During the last few decades, we have not only been witnessing new and more threatening military conflicts, crises and tensions, but also an unimagined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ich could be regarded as a reason for optimism.

countries and societies, as well as on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New divisions

Therefore,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the present British government under Mr Blair offered a revolutionary solution for overcoming the very sensitive break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besides a basic supply of public goods (among them also public broadcasting), it will provide the poorest families with access to the computer and the Internet for a

2010 年以前 Boris Bergant (Photo courtesy by NRK)代表該國出席各種公共廣電國際場合

EBU 的代表 Matthias Pfeffer，作為一個記者，提出警訊，就是媒體被 attention economy 的邏輯掌握，所以這些新聞自由迫害的事件，並未成為社群媒體的重點。也就是演算法已經將群眾應有的注意力奪走，使得奧地利這邊對於鄰國的大事，都容易忽視。他說了一句今天的名言，要能 built the fact not the face (book)。如果這個運算法可以知道人們如何下訂單，接下來就是預測人們會投票選擇誰。

然而 EFJ 的代表 Renate Schroder 卻比較悲觀認為，從布魯塞爾觀點不能幫 RTVS 如何做，而當地的抗爭的確磨練出 Resilient 的體質。而巨觀結構來看，著名的保守右派匈牙利總理 Viktor Orbán 特別前來 Slovenia 訪問 Janša 政府，雙方建立互惠關係。這樣對照出歐盟最近頻頻的警示成真，認為某些中東歐國家，有邁向保守與歐洲中心主義的傾向，背離了歐盟原本的民主價值。因此目前選舉一時成敗，不能說該國危機已經過去，原來政黨仍相當程度控制住媒體。因此他們在歐盟架構提出 European Media Freedom Act，試圖從區域力量來規範這種在地的抗爭與迫害情況。Renate 提出，斯國的案例，其實說明了真實的轉型並沒有成功實現，而且該國一般民眾並未十分重視。

Pfeffer 最後建議，從樂觀角度來看，他希望西歐的主流公共廣電新聞節目，是否以數位平台方式，播放給斯國這種小型規模的經濟體，只要用該國的 subtitle 的轉譯，就能一步先突破政治人物的天天控制意圖。他同時回應，最近由 Klaus 與 Fuch 提議的 A Public Service Internet Manifesto 建議案，應該是一個強有力地介入策略，讓歐洲人民有一個共享的公民網絡文化，突破各國各別的掌握企圖。

不過，在這個對話中，EFJ 與 EBU 有不同的觀點碰觸火花，歐洲記協認為

EBU 已經淪為一種作影展與影片交換的活動單位，也重視各會員的巨額會費的貢獻，所以對於匈牙利的公共媒體，仍然認定他們合乎公共媒體的會員標準。當然，也無法幫助 RTVS 這種小國媒體脫離政治的干預。

不過，這次會場上 ORF 製作了一個專題出版 *Public Value Texte 25*，納入很多篇幅討論分析斯國近年來的新聞自由與公廣問題，受到許多學者認同。這種 *media assistance* 來自鄰國的幫助，成為民族國家還有力量做良性改革的典範。Ksenija 最後回應，提到一個真實的挑戰，就是公共廣電必須要與從來不看中間偏左價值觀的民眾展開互動，他們不然鎖定社群媒體，或者只看民粹主義的 *Tabloid* 小報，如果不能與他們對話互相了解，斯洛維尼亞的媒體戰，不會有更多決定性的進展。

最後由 Barbara Thomaß (德國資深學者) 為今天討論做一個 *wrap up*，她提出四點必須有的改革：

1. 建立 *Common Ground of Quality*，而非 *Elite Quality*；
2. 新聞界需要營造整體的 *Ethos*；
3. 社會的民主需要新的形式的 *Solidarity*，而非社會主義那種弱勢民眾的整編；
4. 新聞界的品質更要在聆聽 (*listening*)，而非一直自我宣告，而且要把聽來的傳遞出去給社會，Jürgen Habermas 最新的說法就是民主社會的 *morality core* 在於“willing to recognize others”，這就是一種新的 *Etho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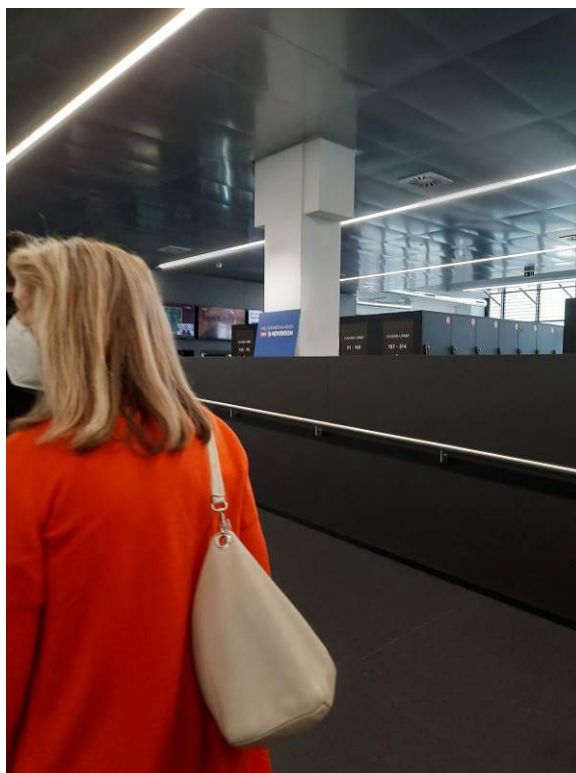


Barbara Thomaß 為整天會議做出重點摘要，讓我們想想前路該如何走

第一日的活動，在經歷諸多討論場合後，ORF 安排一場舒暢筋骨的參訪，就是巡禮他們將於 10 月落成啟用的整合式新聞編輯樓層，全新概念，多軌多工製作，沒有固定桌面，全然彈性與機動的空間。終究，大家都要脫離傳統的侷限，擁抱網絡文化的今日，很充實的 Practice Day。



背後全新的編輯室如 BBC(西方)或 MediaCorp (東方)之公廣一致的做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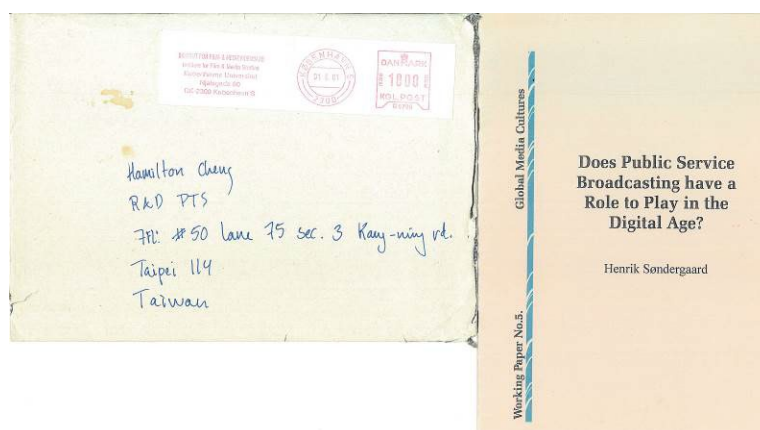


參訪中導覽員指出新聞部員工的 Locker (圍籬的後方箭頭之處) 文化是一個機動性設計的衝擊，在歐洲工作文化傳統中改變得來不易

維也納大學傳播學院的學儒對話

9月20日的早晨，RIPE正式移師維也納大學傳播學院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Vienna)，展開為期兩天的問題對話。開題者為該學院的媒體治理教授 Katharine Sarikakis 的專題演講，她為『奧地利媒體系統』提出看法。其實，Sarikakis 則提出整個歐盟區域的變動，可能比單一奧地利的狀態更重要。

她首先引述丹麥的公共廣電知名學者 Henrik Søndergaard 的詮釋：「我們所理解的公共廣電，其實與其他的非營利媒體如何在廣電管制體系下運作有關，這種理念與時俱變；所謂不確定性，真是來自過去十年對於公共廣電概念的疏離」她也指出，2016年至2020年，整個歐洲公共廣電總經費已經削減1.7%額度，但是如果算入通膨率之後，削減率高達7%。



**Henrik Søndergaard 2001年親自寄贈他的作品給我
2022年在維也納聽聞他的引述，讓我想起此事**

然後 Sarikakis 展論她的看法，認為1980年來整個歐洲的廣電秩序就開始經歷結構衝擊，很多公共廣電的基本信念與價值觀一直在震撼中，聞此議論我覺得歐洲對於公共廣電的衝擊相對太有宿命觀，以致近期的反民主的政潮與數位化激進的再殖民威脅，促使研究的學者，改採他路進行防禦，其中最力推的就是市民化的教育與包容文化的倡議 (civic education and inclusive)。

她略述了一斷歷史的潮流衝擊，自1990至今，顯見歐洲公共廣電幾乎要處理這一切關乎歐洲統合、地緣政治造成難民潮、還有極速成長的極右派政治團體，這種似乎大而可畏的衝擊，不可卸責，但是託付的職責似乎也永遠無法達標完妥。其中提到一處可能的出路與亮光，就是公共電視應該左右兩極端政治團體的對話平台 (Consequently, the role of PSM in creating a shared national conversation which represents a diverse)。

最後她以自己來自希臘的國籍立場，強調現今是紀念希臘公共廣電 (ERT) 被停播事件的十週年當下，而今來看，這真是一個殘酷寫實的試驗，歐洲區域可以見證一旦公共廣電被停播後的社會景況，人文與人才的損失慘狀，以及各種游擊新聞學的出動，牽動了新聞理念的激烈運行。



維也納大學教授 Katharine Sarikakis 博士的演講與後續的座談

演講畢，Sarikakis 接續組織一個座談，實際介紹了該國目前的媒體狀態。參與座談者有四位，首先由記者無疆界組織 (RSF) 的副主席 Julia Hernböck 發言，她認為該國媒體最大的威脅在於經濟性的壓迫，而且這個國家政府依法編列媒體廣告預算高達 2 億 2 千 3 百萬歐元，遠高於法定補助報業發展的基金十倍以上，這是一個罕見與詭異狀態，而且不當地使用這筆廣告預算，也導致了 2021 年原右派政府總理 Sebastian Kurz 的下台。但是，近年來政治勢力發動很多對新聞記者的攻擊，如 ORF 的副總監與節目主持人 Armin Wolf，就有一個專屬他的醜聞爆料網站，這是一個假新聞來源，但是從專業者來說很好辨認，但對一般民眾來說則誠屬困難辨真假。

Thomas Steinmaurer 來自薩爾斯堡大學，他的興趣在研究數位時代的公共服務的轉型，如何將公共價值注入到新的網路時代，他認為公共媒體在歐洲已經有太多的財務經費制度的立論與探討，反而缺乏對於危機的定義、臆測政治陰謀論所引發的影響、還有假新聞的操作，這些重要議題更需要置入公共媒體 PSM 的新時代議論。

來自維也納大學的 Gentiana Ramadani，她提出的研究興趣在於如何將公民參與的意義注入公共媒體的運作中，並且對奧地利、德國與希臘三國做比較性的研究。但以奧地利 ORF 如此成功運作的公共價值專案部門而言，居然公民仍然沒有一個法定的發言位置，介入這個公共價值產生的過程。她致力突破這個癥結，

用一個兩年的計畫，讓 PSM 組織找出信差者 (messenger)，介入這個程序，能大大地改善兩端的參與意願，所以她認為 PSM 的 Messenger 是一個發展的重要指標。

第四位研究者也是維也納大學的研究者 Jakob-Moritz Eberl，他的興趣在於政治傳播的過程，公共媒體如何建構信任感，特別是新冠肺炎流行期間的狀態。他操作大約 30 波的團體訪問調查測試，了解很多信任感的建立包含對於 ORF 的態度。結果他發現在 2020 年 3 月，幾乎有 67% 的樣本都信任 ORF，但是到了 6 月居然極度下墜到只有 38%，這其中該國社會產生了極大的爭論，特別是對於防範 COVID-19 的公衛教育有了很大懷疑，有一定群體對於政府、科學家、及公共媒體這三個環境，提出了信任危機，而這些背離者，似乎公共媒體無法贏得信任，但是也要問是否公共媒體需要照顧這些爭議者的信任乎？

早上場的座談，似乎也是一種歐洲式研究公廣的縮影。簡言之，歐洲政治以議會多黨的內閣制為主，直接透過預算審議對於公共廣電的制約，與時俱進，這個微妙過程一直為研究者的至高關注，接續就是典型的公共媒體存在基礎，論及民眾對於公共媒體的信賴，再者就是新的公民參與模式，是否真能改進統合主義制度 (Corporatism) 下的公共媒體機構政治，這種視為穩固與常態性的政治傳播組織，是否需要震動一番以迎接新的時代挑戰，甚至如何面對民粹主義與極右派的政黨支持者，這一類的民眾團體是否仍是他們的公眾？

民族主義緣起的歐陸，他們的公共電視較少討論如國家發展、國家共識等這類上層問題，比較從下發展一種理型的公民社會，意圖找出公共媒體一直可根植其上，隨時代更新創新的培力模式。

新國家級議題非歐模式的專題討論

缺少國際出席脈絡的 RIPE (歐陸核心為主)，今年為此邀請兩位不從西歐自由與社會主義出發的觀測者，來做一場專題討論。本會代表與非洲學者 (迦納) Kobina Bedu-Addo，為大會中唯二的非歐代表發表者，也在此場有很積極的參與。

首先來報告的是羅馬尼亞籍的媒體記者與研究者 Marius Dragomir，從 2018 年他在 IAMCR 的專題研討會發表以來，儼然成為 PSM 研究領域內的制度論者，由於他採用非西方的傳統定義，擴大 state media 的內涵，同時以時代意義涵蓋幾乎全球國家做分析，產生很大的參考意義。

他先於 2021 年發布調查報告 “State of State Media”，由位於匈牙利的中歐大學 (CEU) 的媒體、資料、社會研究中心 (Center for Media, Data and Society) 出

版。這個中心也有資深的公共媒體研究專家，如 **Monroe Price**、**Stefaan G. Verhulst**，都是上一世紀的國家與媒體關係的重要學研作者。2022 上半年，Dragomir 再次於 IAMCR 北京年會上發表進一步的新國家媒體圖譜學 (new state media typology) 的詮釋 (第二、三作者為 Horowitz, Lowe 等人)，這次對於國家媒體概念的評比有了很生動的排序 (如下圖)，正如本次報告一樣。

Category	Funding control (state-funded)	Governance (and ownership) control	Editorial control
State-controlled media	yes	yes	yes
Captured public/state-managed media	no	yes	yes
Captured private media	yes	no	yes
Independent state-funded and state-managed media	yes	yes	no
Independent state-funded media	yes	no	no
Independent state-managed media	no	yes	no
Independent public media	no	no	no

Figure 1. State Media Matrix: A Typology of State Media (modified from Dragomir & Söderström, 2021)

而本次他做了這個階段的總結分析，同時總報告剛於 9 月發布。報告本意在於展現一個新架構來研究國家媒體 (涵蓋公共媒體)，調查總計 157 個國家。而且，對於媒體結構、運作、表現都有詳盡表列與評比。終究本調查的規範性 (normative) 意義，仍然在於標示媒體自由的獨立性 (autonomy)，以此作為一個階梯式的排序，以達成一個全球圖解的寓意。其中涵蓋七種模式，從最優到最劣的設計皆有之。

調查結論是，只有 19 個號稱獨立的國家級媒體 (占總樣本 16%)，而被政權列入俘虜下 (capture) 的媒體高達 84 個，而旁及發現私人媒體被政權擄掠的下場數目更加惡化，其中匈牙利的全國媒體幾乎都納入了國家政權之控制，最為驚人動魄。他綜合這些發現，在會議上提報一下幾點結論：

- (1) 建構獨立的公共媒體遭到極大挑戰，相關防禦與再建構工程急需備案妥當
- (2) 追尋獨立的公共新聞媒體，在地方媒體興起當中看到希望與實績。這些在地

區性從事的創新網絡的經驗，急需記載與推廣

- (3) 獨立公共媒體的強化，逐漸成形，如在波蘭的發展，高品質的新聞服務，多平台流通策略，可以做為經營模式而且獲利
- (4) 獨立有品質的新聞服務，已經成為全球社會呼籲欲求的服務標準，公共媒體應該在此有更多的投入，回應全球的需要

Debunking misinformation leads to arrest in India

AHMEDABAD, INDIA

Case raises concerns about independence and freedom of news media

BY SUHASINI RAJ

The two men were unlikely candidates to work in the news business.

Neither had a background in journalism, but both were alarmed about the surge of misinformation in India that followed the rise of Narendra Modi as the Hindu nationalist prime minister. To take on this problem, the men, both engineers, started Alt News in 2017.

Since then, Alt News has become a leading fact checker in India, debunking rumors on social media that often spiral onto television news, including those about child-kidnapping gangs and those that say Muslims are spreading Covid. Calling out hate speech has become part of the site's work, as it has taken aim at viral posts that inflame sectarian tensions and that sometimes move violent mobs to attack innocent people.

Led by its founders, Mohammed Zubair and Pratik Sinha, Alt News has criticized supporters and officials of Mr. Modi's Bharatiya Janata Party for statements targeting minorities.

But in a reflection of the growing concerns about the independence and freedom of the news media in India, Mr. Zubair has landed in the authorities' cross hairs. He has been arrested on charges of hurting religious sentiments and is being investigated by the police after anonymous critics and B.J.P. officials accused him of spreading communal unrest.

"People in power want to shut me up for exposing their propaganda, their lies and their hate campaigns."

Mr. Zubair, an engineer from a family of farmers, is also an internet activist. "They want to scare other journalists and activists by targeting me."

Mr. Zubair, a Muslim, said that rather than amplifying misinformation and hate speech, he was trying to highlight them so the authorities could take action. Still, he worried for his family's safety this summer as #arrestZubair trended on Twitter. He temporarily stopped his children from riding their bicycles outside and from going to school.

The media landscape in India started to change when Mr. Modi gained power in 2014. His party realized the potential of reaching voters directly via social media and spent millions of dollars to mold public perception on platforms like WhatsApp and Facebook.

"People in power want to shut me up for exposing their propaganda, their lies and their hate campaigns."

Critics say that engagement, and later copycat efforts from other political parties, lacked the filter of a traditional news organization and was aimed at millions of people who were using the internet for the first time.

"I could also see that propaganda was building up and how misinformation was part of that," said Mr. Sinha, then a software engineer in Ahmedabad in the western state of Gujarat, who started debunking misleading photographs. He was not the first person in his family to take on Mr. Modi's acolytes: His parents were activists who had faulted Mr. Modi for not doing enough to stop violence against Muslims in the deadly Gujarat riots of 2002, when he was chief minister of the state.

Around the same time in Bangalo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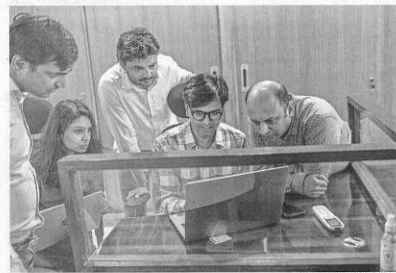
Mr. Zubair, an engineer from a family of farmers, is also an internet activist. "They want to scare other journalists and activists by targeting me."

Mr. Sinha, an engineer from a family of farmers, is also an internet activist. "They want to scare other journalists and activists by targeting me."

"They are a consistent and thorough voice in myth-busting and fact-checking," said Anant Nath, the editor of Caravan, a monthly magazine. "They are doing very important work establishing public accuracy."

Alt News was among more than a handful of websites that emerged in India in the past decade to counter misinformation spreading on the internet. "The mainstream media had failed to counter these narratives," said Jency Jacob, the managing editor of BOOM, another Indian fact-checking website. "In India, disinformation often takes the worst turn towards building hate against certain vulnerable sections of society."

And the work is only getting harder. Government data show a nearly threefold rise in India of instances of "fake news" and "rumors" from 2019 to 2020, even as social media companies take steps to curb the spread of misinformation. Mr. Sinha, 40, said that although it was tough finding who much of the bad information originated, all political



Alt News staff members in Ahmedabad, India. The site has debunked rumors and bogus information in India, but Mohammed Zubair, second from right, has been arrested.

parties used it to further their political agendas. "But the party benefiting most from it was the B.J.P. — that much one can say," he said.

This year, Mr. Zubair highlighted comments made by a B.J.P. official that many Muslims considered as insulting to the Prophet Muhammad. The incident became a diplomatic embarrassment for Mr. Modi after Muslim nations demanded an apology, which the official did offer. Mr. Zubair has also called out extremist Hindus who urged the killing of Muslims.

A B.J.P. spokesman, Tom Vadakkan, rejected the assertion that the party benefited from misinformation, adding that Alt News itself had faced similar accusations. In response, the founders of Alt News say they are providing a public service by debunking bogus claims.

Some critics say Alt News staff members aren't journalists — four of 14 staff members have journalism degrees — and point to Mr. Zubair's opinionated and sometimes abrasive tweets as evidence. This summer, Mr. Zubair was jailed after an anonymous Twitter user, citing a tweet from 2018, accused him of insulting a Hindu god and hurting religious sentiments. He was eventually granted bail but only after being dragged from courtroom to courtroom, paraded before the news media in a pile of cases that made it difficult to win release. He is still being investigated in that case and for other complaints that he caused unrest with his tweets.

But despite this turmoil for Alt News, which is run by the founders' nonprofit company, Fravdi Media Foundation, supporters have stood by it. Donations

that fund the s through contri a month per p

"What's help small donatio them," Mr. Sin Control of t India has com ter a hostile t sion, an inde NDTV. Many mised editoria tam Adani. A friend of Mr. 3 stake.

At Alt New usual despite t Mr. Zubair: Th an office in Ah a bureau in Ko mania is in th At the Ahm morning, Mr. r rest of the t which news a prioritizing w potential to ca

Nearby, an Parmar, repla' beating a man Soon' has reaf co-workers h was of a persc him's lync article on the rected the rec that the video tens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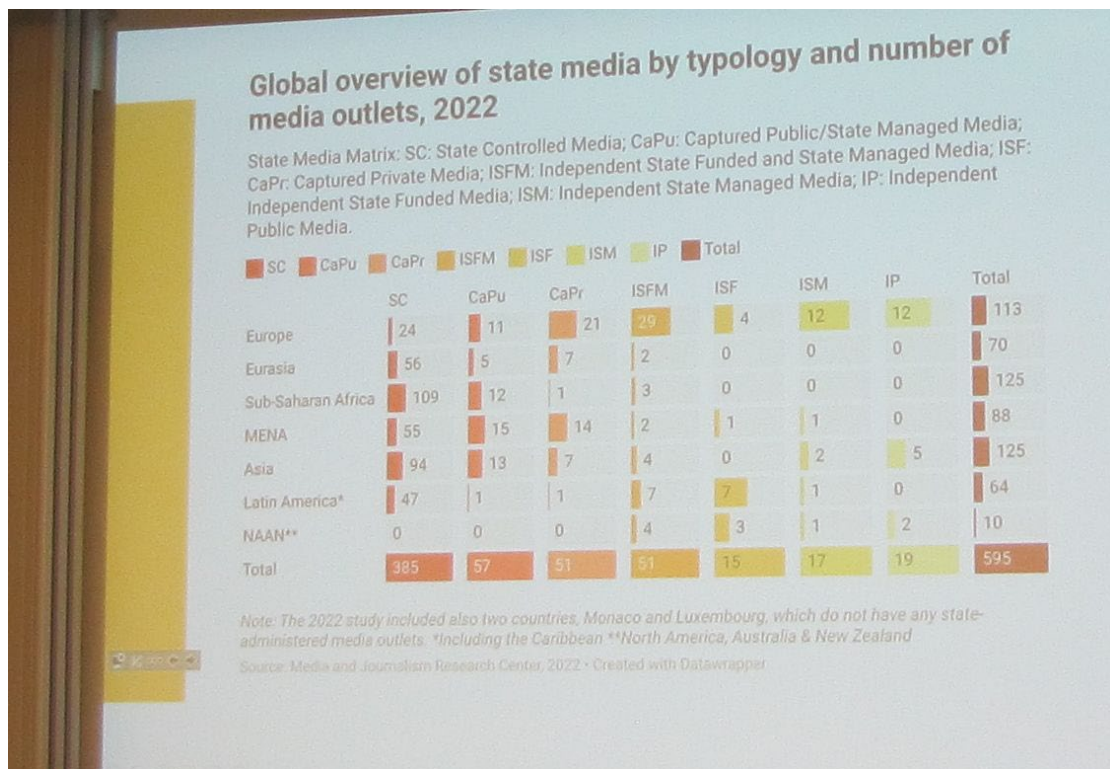
Ms. Parmar ist, said no sp be a fact chec ting what's an a mission for 1 "Our job en zen the right t said. "And in ti matic, it sec tant in a dem

舉例而言，我在維也納期間就閱讀到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23 的這則報導

我在會後 Q&A 時間，有發問 Dragomir 為何設計這樣精細的量表，而如何確認一些比較 ambivalent factor (自相矛盾) 因素可以放在同一項模型中，如 Taiwan TBS (公廣集團) 被列入第三等級 ISFM (independent state-funded and managed media)，這種少見的個案，如何說服傳統學界的認定。Dragomir 回應，如果說要在國家媒體與獨立媒體之間一定做一個分野，其實這是化約主義 (reductionism) 的做法，他要突破這種框架，認識真實的政治與媒體制度的互動關係；而且這種階梯式的定位關係，其實象徵著任何一國家媒體，從最下層 (independent public media，見前一圖)，至最上層 (State-controlled media) 的發展是會流動的，換句話說，比較需要警示的是「向下沉淪」的走向。而且，從財務與經營上的壓力，很可能轉換到編輯權的干預壓力。因此，這是一份務實的觀測指標建立。

他指出不應當把芬蘭公共電視 (YLE) 與中國的中央電視 (CCTV) 視為同一等級就是他的初衷。其實當年(2002)，世界銀行請來專家對世界 97 國家做一次媒體制度檢視，將 BBC 等同於北韓 KRT (The Radio and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Committee of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的定位，鬧出大笑話，結

果此案不受各界重視，毫無引述。從時光隧道來看，這次 Marius Dragomir 的努力，似乎重新建立了這種評定指標的信任，讓各界觀點咸認為這是一種可以參詢的非西方立場的研究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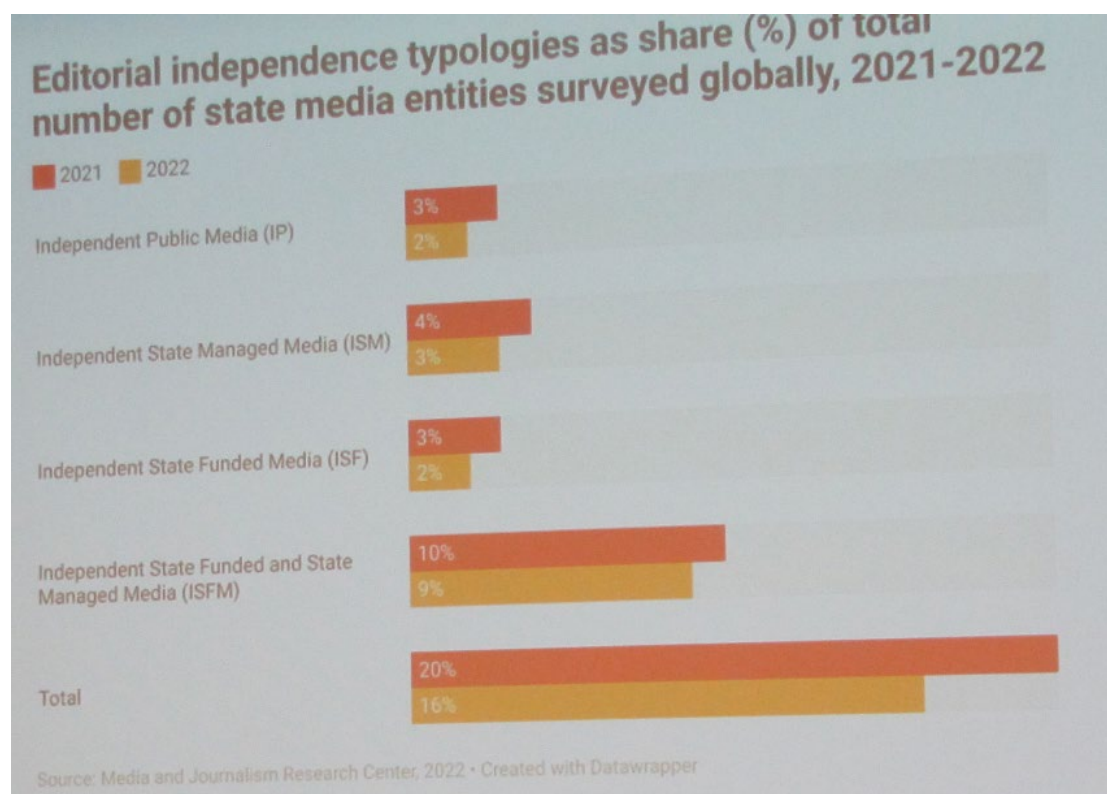
**Marius Dragomir 的研究結果之精確性與可解釋度 (tenable)
讓現場各方專家能接受**



**今年 9 月出版的這份報告，對比相距二十年前世界銀行委託的同性質調查
可謂遲來的進步**

以台灣而論，能列入 ISFM 之等級，有一個最關鍵的指標，仍屬於 RSF 的新聞自由指數調查，然其他管制文獻的掌握，Marius 也相當精準，了解台灣公共

電視的制度與財務，與國家國會的管制效果息息相關。所以就此而論，此一指標算是有寫實寫照的意義，同時也明確排定我們在國際中的優異位置，但也沒有誇大的立場，誠屬可貴。從下表可知，全世界只有 16-20% 比例的國家，可以享有國家等級的獨立公共媒體，而台灣所在的 Level Fourth (第四層) 區間只有 9% 的國家總數可名列此區間，總共 19 家，而亞洲區只有 4 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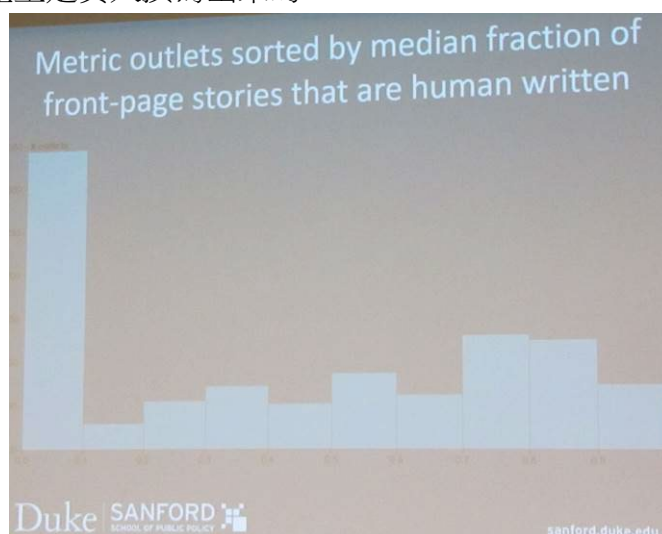


另外一位提報有關國家媒體定位的研究者，為 Philip M. Napoli 教授，他其實在台灣小有名氣，其著作在地有中譯本：邊明道、陳心懿譯 (2005)：《傳播政策基本原理：電子媒體管制的原則與過程》。這次 RIPE 的首次邀請，很榮幸能聽到他解說目前美國影音媒體的核心問題。

Napoli 以六年期的研究，鎖定目前美國地方新聞機構與記者的經營殞落情形，同時觀測所謂網路上興起的地方新聞全國平台，號稱 Metric Media News and Network，他掌握了美國各大洲的地方新聞來源，但是幾乎都是新的面孔的經營者。他用“pink slime journalism”這個字眼，來形容問題的嚴重性。Pink slime 是說肉品工廠將原料切割，將剩下的邊肉轉去做熱狗等類的作業。換句話說，Metric Media News 提供的就是很可能是變造的新聞成品。

就經營性質而論，有幾個特點顯示出高度可疑之處。首先，這個地方新聞平台是一種大規模經營的布局，最高的容量平台居然擁有 1,000 個地方新聞網址，而背後的經援都有相當規模的基金提供；他用“paper plant model”的工廠生產模式說明，此一系統能靈活地收受公關公司 PR firm 與政治顧問公司的金援，

針對特殊議題的新聞提供產品上架。而他用數據說明發現，這些新聞絕大多數為機器 (AI) 自動產生，少數才是真人寫的新聞。檢視 350 個新聞網址，總量中只有 10%的媒體產生是真人撰寫出來的。



另外一個數據，就是以 2020 年美國大選為例，選定的三個州 (swing state)：喬治亞、亞利桑那、威斯康辛等，選後有高比率的投放內容，談到選舉舞弊，高達 71-78%的產量，然而全國平均產量才 16%。然而當法院判定選舉結果無誤後，這些州的報導突然下降幅度達 64%至 95%之多。

State	% Content covering electoral fraud (Election to Jan 5)	Stories/day (Election to Jan 5)	Stories/day (Jan 9 to Feb 1)	% Change in stories/day
Georgia	78.46%	2.41	0.13	-94.81%
Wisconsin	71.15%	0.96	0.17	-82.69%
Arizona	76.00%	1.39	0.50	-64%
Median control	16.22%	0.69	0.29	-38.59%

這種跡象已經被政府公部門注視，相關改革也出爐。美國選舉委員會判定，這些新聞網址要逕行公開內部管控，以及提報經濟來源。委員會同時做兩階段測試：第一階段確認是常態生產新聞的服務平台 (press entity)；第二階段是證明其非為政治競選團體所有，所有經營通訊必須以達成 press function 為務。

這是負面的管制行動，但是也增加了正面管制行動。包含一些有名聲的基金會，如克里夫蘭基金會的投入，做真實的非商業金融的投資模式。紐澤西州則將地方廣電頻率拍賣，將標價 500 萬美元投入地方新聞發展基金，而相同的行動在

加州也一同開展，透過支持州政府的團體捐獻 2,500 萬美元，加入這種地方新聞基金。以上行動，是以公部門的介入，來對抗這種背後有特別政治動機的網路新聞學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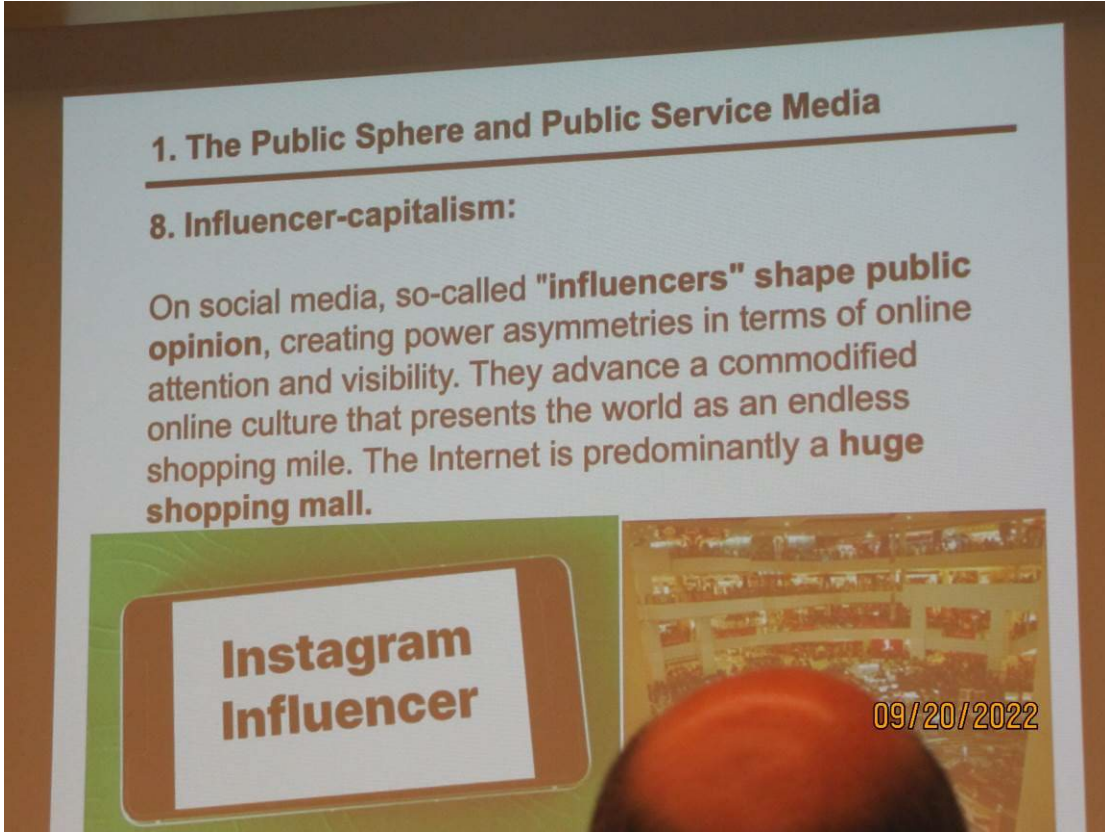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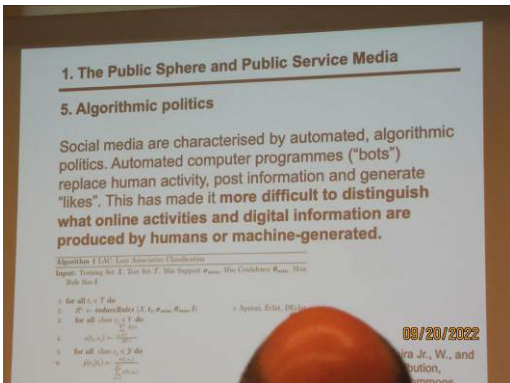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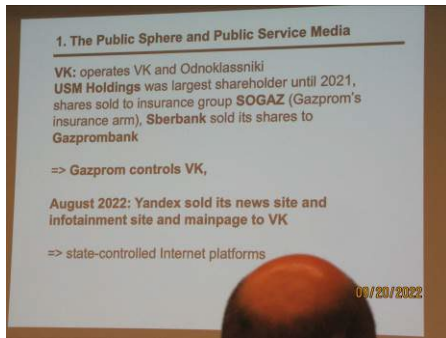
下午的「獨立新聞學發展概況」的專題報告很有收穫

第三位的講者雖來自西方，但是從馬克思政治經濟立論為少見之士，近年來著述豐盛的德國學者 Christian Fuchs，他以資本主義的媒體體系作為主要研析與批判對象。兩年前，他轉戰捍衛公共媒體與公共領域在數位化時代的意義，依然戰力十足，著作豐富。他轉變了傳統以來政治經濟學派，對於公共廣電媒體保持一定距離感的疏離狀態，他在最新著作《數位民主與數位公共領域》(Media,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第六冊論述，預計 2023 年出版)，已經將公共網路媒體與公共網際網路平台 (PSM, Public Service Internet) 列入第九章作專題討論。

而本次專題演講，他整理了許多趨勢顯示網際網路的集權化與商業監控化之問題嚴重。幾張投影片中，揭露了幾個事實，包含中國與俄羅斯對於網路自由的監禁、AI 帶來的網路政治之操控威脅、左右兩派在政治動員上之過濾器與放大器運作、以及資本主義的購物天堂之籠罩。這些趨勢的整理與展望，可謂驚恐。據此，他已經於 2021 年開始推動的公共服務性質的網際網路，更顯得重要。



右邊講者 Christian Fuchs



上：揭示俄羅斯與中國的威脅；中：網路國度中之 AI 干政與政治意識形態機器肆虐；下：資本主義將購物天堂充斥網路公共空間

Christian Fuchs 最後再對公共廣電領域做出建議，他認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

交易稅，應該開徵作為營造未來 Public service internet 之基礎，跨各大洲的公共廣電應該整合出一個國際服務影音串流平台，平台上的使用者資料應給予大家控管權限，再者公共媒體網路之員工勞動條件應強化與廢除無保障之聘僱，持續公共網路媒體之治理改革（有鑑於 2022 年德國 ARD 之柏林布蘭登堡分台之總監發生財務醜聞），公共廣電媒體應學習平台運作的合作模式，同時將決策權力分散給勞工、用戶與觀眾手上。

以上建議，都是劃時代與即時變動下的反省，很值得公共廣電媒體經營者持續採納與行動。

論文發表場次之交流

本會代表此次前來 RIPE 發表之論文，被分配歸納至 A 組工作隊，主題為 PSM 組織內新聞採訪與新聞學之政策發展。而本會與迦納代表也都列入此區隊，顯見政策性思考仍為非歐地區之顯學；然歐洲部分，學者則擅長花更多精力在編採實務與跨平台串流經驗，以及新的生態系對第四階級古典概念的衝擊上，旨趣觀巨微頗為不同。

綜觀四個工作組提報內容顯示，本場次為最有國際觀交流之意義，發表時與芬蘭、比利時、歐盟、匈牙利、希臘、奧地利、迦納（非洲）同台，相對於其他三組，他們卻都只有歐洲各國代表的一堂聚。

本場的各种案例，其題材與角度也是多元展現。芬蘭個案，揭示了強大的公廣 YLE 集團，在商業勢力的圍攻下，不免遭到暗算以排除不公平競爭為由，限縮他在 text-based 資訊服務項下的新聞報導功能，而且這其中有歐盟理事會與商業勢力之間不透明的共謀之嫌，驚人的發現。比利時的團隊，詳解歐洲八國新聞製播準則內涵，則發現有關多元觀點報導的指導，居然缺乏強有力的定義，同時也缺乏操作型定義，結果呈使這樣的核心價值只是一個概念，或者因個案而異而有不同標準，亟待改進。

另外有兩篇討論平台經濟與公共廣電的核心論文。一者是歐盟資助的跨三國比較研究（英國、丹麥、希臘），了解公共廣電如何在平台經濟當道下存在，使用何種資源求生。簡單說，BBC 可以游刃有餘執行合作制度（cooperative philosophy），引領全英國各商業媒體一同平台化，並分享資源；丹麥則強調該國的文化生續必須要有 Danish Radio (DR) 的存在，同時明確制定發展目標要強化本國文化，對於外來平台儲存防禦力，對於本國內容品牌強化貢獻度，總之是一個防禦的策略。然希臘，則相當弱勢化，公共電視 ERT 的存在貢獻補殘弱的商

業電視體質中不能達成的功能，然而她的能力也僅在形成一個理型的座標，並非有實質的影響力。ERT 仍以 EBU 的成功範例馬首是瞻，期望在平台競爭壓力下，投入更多新的製作節目能力，並改善體質數位轉型。

另一位談論平台經濟則直指衝擊所在，奧地利資深學者 Natacha Zeitel-Bank，提出了整合歐盟經驗的精心之作。她指出，在歐盟層次，以數位服務 (DSA) 與市場 (DMA) 規範眼光下，必然會針對中度觀與微觀層次的平台運作給予糾正，特別是強化媒體自由與多元意義，抑制假新聞資訊的流通，要求運算法的透明化與檢核，守門人管控內容手法的揭露。AVMSD 之外，2022 年底歐洲媒體自由法將會出爐。但在中介端層次，競爭就全然不同。目前守門人 (gatekeeper) 的經濟意義已被規範確認，公共電視的傳統運作將失利於平台經濟的控制，而基本資訊服務對於年輕人來說，平台已經是他們的大宗來源 (號稱第五力)。

在使用者層次，最為關鍵。目前很多 prosumer，自己介入內容市場，成為 Influencers，Social bots 這類生產自動化人工內容者，加上運算法的加持，讓個人化的資訊產品成為主流，迫使傳統媒體退出無法影響這一世代。但是，相應社會危機期，傳統媒體仍有能力介入中度觀 (meso) 與微觀 (micro) 層面的使用者需求。而且歐盟的管制規範，已經開進行防禦的反撲。首先，將數位的中介面 (社群媒體、搜尋引擎、運算法的加總) 定位清楚並研析透明，同時調查歐洲政府的廣告運算的招標公平性、公共廣電的獨立治理機能的策勵、還有訂立保護新聞記者的措施。她也舉例一些極端的管制，如今年 7 月 18 日，奧地利憲法法庭判決沒有繳交 ORF 廣電收視費的公民，將無法收視該台網路影音串流節目，這翻轉了原本較寬鬆的影音串流的消費法規。終究，看來歐盟需要盡早制定一套超國家疆界適用的廣泛要求平台業者問責的機制。在中層觀層次，公共媒體應該盡可能涵蓋社會各黨派勢力構成董事會，確保有公平與透明的財務體系，同時淬鍊自身獨立治理的能力，才能有效面對這一波變局。



歐洲學者仍活躍於 Workgroup A，但也有國際觀點的參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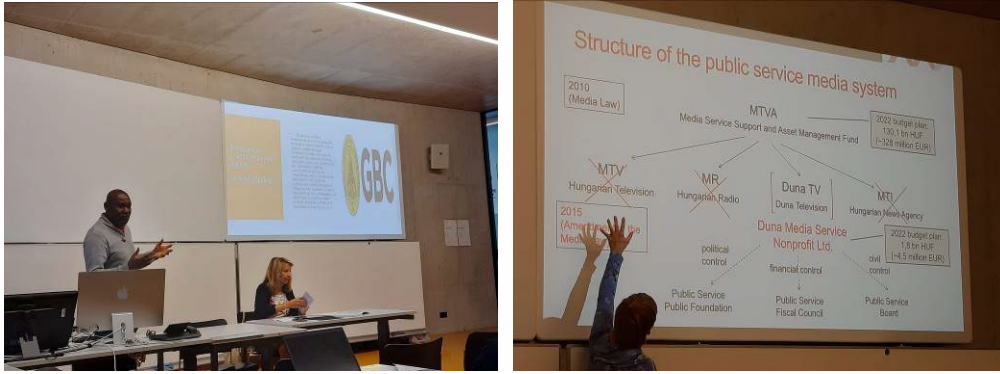
台灣、迦納與匈牙利為本場次的三個國家個案討論，與歐洲誠如不同面貌。台灣部分，我以事實查核近年在我國的蓬勃發展，來回顧與公共廣電的合作，並以華視總經理於今年在國民黨黨團會議中之對話對立事件，作為一個切入點。我的整理發現如下：

- (1) 始自太陽花學運之後，事實查核本來是一種政治信念下的行動方案，經過一番衝撞與在媒體表現上的爭議，目前已進入專業的培訓與導向精確新聞學的定位，脫離一種運動，而是自公民新聞學後繼起的第二春創新的開展；
- (2) 然公共廣電與運動者之間過去之合作，因社會發展本來路徑的特色，也如工業先進國家一樣，被描述為左傾的運動色彩代表者之一；
- (3) 台灣目前事實查核的主要爭議，在於政府官員發言是否可以作為一種 **political statement** 逕行查核，這個問題未有定論；
- (4) 2022 年台灣公廣集團的華視爭議，成敗之間取決於領導者在社群媒體上發言的公信力，此一影響深遠造成新聞自主之立論是否能成立受社會支持；另台灣案件，居然可以類比奧地利 ORF 與極右派政黨 FPO 黨總裁之間的對抗，兩者對比後很有對照意義，但結局相左。

迦納案例，則是殖民國家新興獨立後，一個在地公廣 (GBC) 的長期轉型問題典型，如今遇上數位轉型的挑戰致使該議題更為複雜。承續英國的傳統，GBC 一直都能維持該國新聞資訊娛樂教育的主要承載者，但是官方政府部門的色彩無法脫除，連帶使新聞獨立自主功能不彰。這應該也是新興國家至今，都還存在的問題。由於政治與媒體關係的曖昧化，所以 GBC 應有的經營政策從未明文化，驅使其在媒體生態中爭取生存的商業化作風，與維繫國家宣傳之間游移不定，各取所需。如何使政策明確化，該論文上未有行動方案，透過討論，我給 Kobina Bedu-Addo 一些建議，當從國際化的觀點審視。另外，也提供一些台灣華視轉型的建議，當從 **State-Owned-Enterprise** 的組織角度突破。

我們與非洲的發展距離甚遠，政治經濟環境也很不同。但是本次交流，透過本會過去出席 WEMF Fifth 的聯繫工作經驗 (聯合國週邊會議於 2011 年在迦納舉辦)，還有共同認識的友人 (我在加拿大讀書的友人，**Ohene-Ntow, Nana**，目前為該國執政黨的秘書)，藉此與該國代表有很深刻的交誼，同為本次 RIPE 唯二的非歐洲的代表，這樣的聚首交流甚為合宜。GBC 的國際行動仍很積極，十一月將舉辦的 PBI 年會，其總裁 **Amin Alhassan** 就親自出席談論永續經營目標。

第三位提報的學者為匈牙利 **Corvinus University of Budapest (BCE)** 大學的資訊傳播系教授 **Ágnes Urbán**，她以 **Mertek** 媒體觀測組織的專家身分提報。顧名思義，她的論文清楚地記載近十年來，該國公共媒體全然淪陷於一個單一政權的掌握，同時自身發展出傳播制度模式，全然迥異於歐盟的精神與規範，形成對抗。



左：Kobina 迦納的學者；右：Ágnes Urbán，匈牙利的媒體專家

首先該國於 2010 年新的媒體規範下，創設一個整合的公共廣電基金管理機構稱 MTVA (Media Service Support and Asset Management Fund)，2022 年核撥給其之基金達 98 億 4 千萬台幣之多，而原本匈牙利公共廣播與電視、通訊社都被整併於旗下，由 Duna Television 統合成一個非營利的公司，而 Duna TV 不只是原本一個綜合頻道，也是匈牙利海外頻道的經營者。

雖然統合組織，以收綜效成功。但是隨之 Viktor Orbán 政權上台，他有效地將其轉換為國家統治者的聲音，並收攏社會各方勢力，逐漸形成一個不認同西歐歐盟價值觀的政權，建構一個非歐盟的文化政權，但仍保留其會籍，形成巨大的矛盾。匈牙利對內以媒體文化等同政權之聲，型塑價值；對外則與俄羅斯的價值觀同調，強化對西方意識形態的批判與建構自我基督教為主的規範觀。Orbán 政權成功地統一各大型機構，同時讓公共媒體認同發聲，以致讓歐盟大惑不解，無法有效質疑國內媒體法已經違反歐盟通用的媒體指令。

而這也是本次 Workgroup A 成員，特別是歐洲人無法理解的建制，直說改革之聲已經太晚響起，公共媒體之內涵已被更變，內部意識形態一致，成為介入的難題。以本篇論文的記載實證，特別以俄烏大戰的評論為例，歐洲人的觀點可能認為友善於 Putin 政權觀點，但是從國際論壇來看，這就是一種多元的戰爭詮釋觀點，從外於歐洲區域來論，說匈牙利公共電視已被俄羅斯 RT 收編之論，可能失之偏頗。但可以確認的是，匈牙利公共媒體的變化，可能是目前歐盟區最頭痛的新聞問題。

Ágnes Urbán 提出，目前 Duna TV 與 MTVA 都是 EBU 的全權會員，難道不能給予一些壓力甚至開除會籍嗎。這一段質疑，使我想起 2014 年在東京的 RIPE 會議上，英國學者 Peter Godwin 也質疑過「白俄羅斯公共廣電」豈可留在 EBU 的會籍內。其實，歐洲本質仍有民族國家 (Nation-State) 之本質，廣電制度屬於各國文化的內政，如尚未達到全面侵害人權嚴重程度，EBU 會給予包容的策略來導正，而非棄絕於外，孤立變為偏激份子，就公共廣電的治理經驗來看，

這頗為合理。匈牙利的問題目前是一個黑箱，因為該公視的實際工作人員，很少出來回應這些指控，並且自我詮釋該台使命與願景。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epartment

Duna Televízió Zrt.

H-1016 Budapest, Mészáros utca 48.

☎: (36-1) 489-1238, 489-1495

Telefax: (36-1) 489-1571

E-mail: lazar@dunatv.hu

Dear Mr Cheng

According to our correspondence we state that Duna Television fully agrees with the INPUT 2006 Statement of Multiculturalism and President László Cselényi would be pleased to sign it.

Please initiate the process of signing the Statement of Multiculturalism for the Hungarian state television Duna TV.

Yours sincerely

Katalin Lázár

這使我想起 2006 年公視舉辦 INPUT Summit 時匈牙利公視來函表達支持之意
對照如今情形不勝唏噓



2006/07/17 週五 下午 06:01
Lázár Katalin <lazar@dunatv.hu>
RE: Duna Television

收發件: Hamilton Cheng (PIS)

Dear Hamilton,
Thanks again for your help! Our president-CEO has decided to sign the letter, so please help me to kick off the process.
If you have any files related about the summit or the signing of the statement, we would be happy to present it on our screen.
I am also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r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Best wishes

Katalin Lázár

P.S.: I am also a media researcher myself, so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me, if you need any Hungarian research contacts.

Katalin Lázár
Duna TV
Hea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el: 36-1-4891238
Fax: 36-1-4891571
Mobile: 36-30-9411677

From: Hamilton Cheng (PIS) [mailto:chengh156@ntu.edu.tw]
Sent: Tuesday, July 18, 2006 8:52 AM
To: Lázár Katalin
Subject: Re: Duna Television

Dear Katalin,

When you feel like to sign the statement, please you will use a formal letter to kick off the process to fulfill your request.

Thank & appreciate.

論文收整 工作小組四發展望報告

2022 年的 RIPE 會議的指導性問題，按著慣例，需要在總結報告時，由四個分組工作小組來提出展望與看法。於是，論文發表場次結束後，午休片刻就展開綜合討論。今年的題目有二則，第一則是強調如何從結構化與概念化去理解目前 PSM 的公共新聞學，所面對的數位時代挑戰；第二個問題是如果有了正確或者公認的理解，那公共媒體組織應該如何回應以取得影響力。今年四個組別分別提出報告如下：

1. 公共服務傳媒 (PSM) 的新聞如何受到傳播政策的影響

- i. 受眾視為公民的研究要持續更新
- ii. 常態性社會成員參與新聞製播的過程十分重要

- iii. 傳播政策的管制對新聞之影響需要跨國性比較研究
- iv. 促成或者失去媒體民主化的關鍵因素亟待研究
- v. 公共服務傳媒的經營者要了解公民群眾的觀點，並參與他們的社團
- vi. 學術界需要與管制者對話，新的 **Amsterdam Protocol** 需要提出

2. 數位媒體生態下新聞與編輯實務的新發展

- i. 實務的研究需要比較性基礎，因為各國文化歷史不同的影響甚巨
- ii. 對於新聞的信任度研究，需要高度的警覺，因為不同時間點變化幅度很大，同時如何測量信任度也是挑戰
- iii. 創新與持守兩種實務觀念非二分法，而是一種良性互動
- iv. 新聞實務存在於四種分析層次，包含社會整體文化面、機構組織運作面、新聞部門工作面、觀眾與公民理解面，需要整合思考
- v. 所有創新的公民新聞學作法，都要有和諧運作的最佳發展觀指導（要合乎民主價值與公共服務使命）
- vi. 推展創新需要有策略性的思維與規劃，同時讓稀有資源最有效運用
- vii. 公共服務傳媒需要與觀眾共作未來，但是要有與觀眾團體之合作本質，而非公關與市場推廣的動機指引
- viii. **PSM** 之創新議題，應搭配一種同儕觀摩的網絡來發現共通的利害關係

3. 跨平台發展下新聞時事報導的挑戰

- i. 需要學者、新聞記者與公共服務傳媒機構的三方合作研究
- ii. 研究者在環境中參與觀察需要注重研究倫理，同時研究方法需要有科技社會 (**STS**)、傳播與社會學理論的定位
- iii. 研究需要超越二分法，同時作公共服務傳媒的批判性盟友，而非把一切實務視為理所當然
- iv. 此一領域的教育訓練需要執行，同時最好要有國際比較的資料作教材
- v. 公共服務傳媒需要就內部組織結構一併研究，此為影響實務的重要面向
- vi. 實務的研究的結果，需要跨國角度的比較，而且一種合作與團結的研究精神也是必備的條件（如 **Journalism Common**）

4. 數位生態下公共服務傳媒如何界定成為第四階級

- i. 從傳統以來，公共服務傳媒如何改變自身核心的結構要記載
- ii. 公視核心價值如何測試，工具是否適當，觀眾的理念要定義
- iii. 泛歐因素與歐洲各國的文化背景定要共同列入考量

- iv. 公共價值導向的變革思維需要被研究
- v. 公共傳媒的製作人推出新的服務資訊要掌握
- vi. 公共服務傳媒對於閱聽人的要求如何回應也是重點



論文發表組的

工作報告，需要堅持到最後，對許多人而言都是一個耐坐到底之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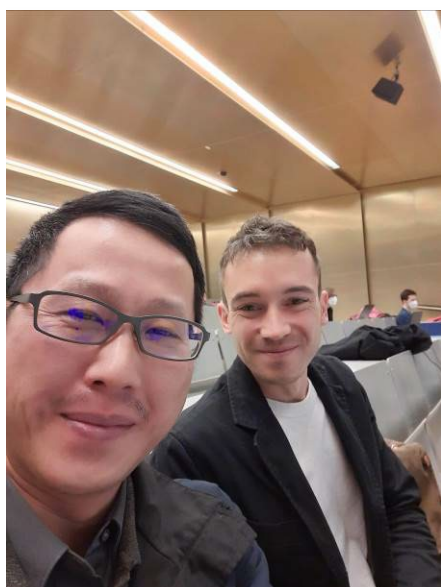
而我在 Workgroup A 的討論場次，也提出三個想法作為貢獻，如下：

1. 就首先概念化了解目前公共新聞創新的問題，我認為必須有雙軌考察之觀察。舉例而言，台灣今年初的 TFC 事實查證的事件，其實導源於合作的中華電視台在申請有線電視新聞台頻道執照的紛爭，換句話說傳統線性的新聞作業世界問題，會延燒到網路新時代的創新新聞群策群力 (crowdsourcing) 的表現與信任度，這兩世界仍會有義意互動，不可偏廢。
2. 此外，根據事實查證中心運作的全球研究，公共電視與其合作的結果，都有

被右派政治團體指控向左傾的意向，這樣的問題，公共電視應當重視，不能視之為當然，而置之不理。公共電應當正視這是一個問題，並且窮其精力來建構與右派團體的連結與對話，避免右派的極端化意圖毀滅公共電視制度，相關問題在奧地利、瑞士與英國都出現了。

3. 台灣這種特殊現代化產物，提供很極端對比有關公視新聞的創新與進步景象。如我們在9月底正式重整「網路新聞組」的辦公空間，他們需要更寬廣與獨屬的辦公（不是虛擬化或移動化）；而同一時間，10月2日開始讓國際新頻道（24小時線性播出）正式放送（over-the-air）上線，兩個絕然不同媒體世代之產物，都在同一時間擴張領域，這就是台灣的現象，絕非歐洲這種公廣市場已成熟的古國可以理解。

本次會議於四個分組的總結報告，畫下句點，與會代表紛紛互道珍重。我與巴西、德國、迦納、愛沙尼亞的青年代表，持守出席到尾聲，惺惺相惜，約定2024年葡萄牙里斯本年會再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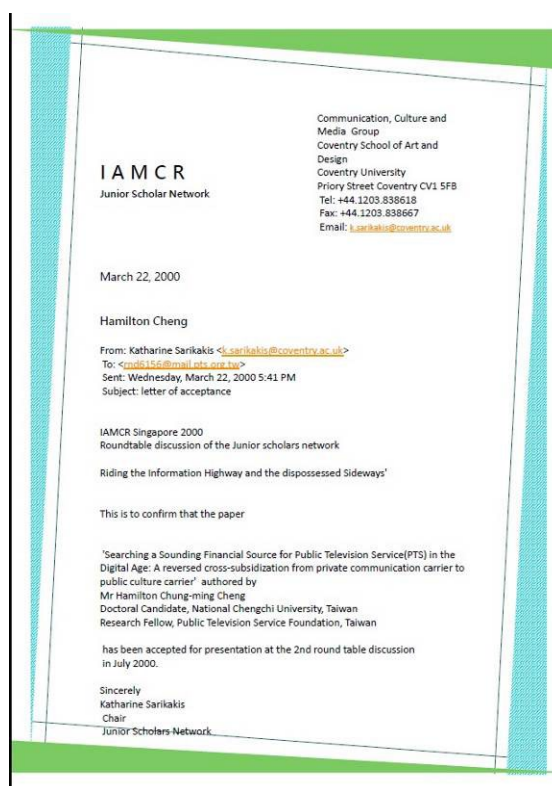
左：我與PMA的執行長 Christian Porter 右：與奧地利 ORF 的公共價值 Officer: Konrad Mitschka

尾聲：珍重再相見

本次 RIPE 2022 年會的出席，掙扎於疫情在本國仍蔓延的情況下，惕勵自己強力出席，同時在本會組織變動下，同事皆有國內要務無法分身，勉力提出「公共新聞學」的創新議題與爭議，超越原本的研究領域。然本會的持續出席，成為現場唯一的「亞太區代表」，維繫公共廣電研究的「國際化」格局（後知日本 NHK 相關團隊已經解散，南韓學者有投稿卻無暇出席），我相信本會持之有恆的耕耘，必然會讓國際社會重視。喜見，原本都不太可能的困局，最後都能突破達成年度目標。

在歡迎晚宴上，的確感受到因著地緣政治改變，我國受到的重視更甚於從前。RIPE 會議的常任經營長 Gregory Lowe 特別前來打招呼，提議台灣應該在公共廣電研究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這一點也是出席發表不間段達十年之久的我們，體會到的一個時刻。IAPMR 的副主席，也是芬蘭學者 Minna Horowitz 特別前來招呼，她以一種研究的角度，來介紹並肯定我們給她的同僚：芬蘭 YLE 的社會媒體部門的總監 Tuija Aalto，Minna 的想法是經過對全球公共服務數位化的評比，她得知台灣公部門在「服務數位化」成效上十分卓著，因此想要了解成功的歷史性因素為何，我就歷史角度解釋，這是一次很特別的寒暄之邂逅。

此外一提的是，在維也納大學傳播學院上，特別再次相認當日專題演講者 Katherine Sarikakis 博士，她是我的博士班同儕（目前是維也納大學傳播系 Media Governance 計畫教授），十分愉快，勾起諸多回憶。想到 2000 年在新加坡 IAMCR 的全球大會上，一起奮戰到最後一刻，為 Junior Scholar Network 爭取到合法地位，贏得一席代表在 International Council 之中。這個經歷回顧，她也特別召來她的學生，見證溫慰那個時代我們可以有所為之事。這次在發表會場上 (Workgroup A)，她特別介紹本會代表為她的博士班同期夥伴。我們在 2014 年 10 月於公共廣電全球會議上 (**World Conference on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於維也納二次相逢，所以至今這是第三次，人生又何有這樣多的機會在專業上交會。這個會首對於台灣公視在 RIPE 年會上的登台，相得益彰，也是與會代表少有的資歷。



2014 年我與 Katharine Sarikakis 相見於維也納，右邊是 2000 年的她給我的論文接受發表證明函，自此開啟了我在公共電視作國際發表的業務

還有一位在維也納的友人，很值得一提。就是 ORF 本次舉辦會議的另一位靈魂人物，前公共價值計畫總監、現任公共價值與能力 (Competence) 計畫高級專員 Konrad Mitschka，除了也在 2014 年那場會議上相識，2016 年 RIPE 於比利時舉辦年會時又再次於同一場次發表，所以至今也是第三次相逢，而本次他已經是位居地主國的主人來歡迎，這對本會代表這次出訪有很大幫助。Mitschka 於 40 年前，曾來訪台灣留下深刻印象，這是國際外交很重要的延伸基礎。

也在這個基礎上，Mitschka 協助本會代表安排駐維也納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新聞組秘書蔡慶樺一併出席本次會議，藉此與當地新聞傳播專業建立關係。蔡秘書也特別引介在 ORF 任職的台裔經濟事務專業記者 Hans Wu，與我見面，建立關係，這就是一個很標準的良性互動之國際事務寫照。



中：Hans Wu；右：蔡慶樺秘書，與本會代表中午休息時間相見 (ORF 總部)

2022 RIPE 年會重新實體召開，再一次給予本會國際交流業務一次考驗，也見證新的地緣政治對於台灣參與國際社會的新形態的挑戰與助力，這次的體驗彌足珍貴，也相信對於本會未來三年董事會的治理視野，定有很大的啟發意義，本文謹此畫下句點，供各界檢視與指教。(全文完)